

孙中山的情感世界研究

周术槐

贵阳学院社会管理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5

【摘要】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其漂泊流离一生的革命生涯中,饱含丰富的情感世界。在其情感世界中,有充满温馨的父母情、夫妻情、兄弟姊妹情、儿女情,也有充满深情厚义的朋友情,更有充满民族大义的民族情与国家情。在其丰富的情感世界中,亲情是孙中山情感世界的基础与前提,友情是孙中山情感世界的支撑,民族与国家情是孙中山情感世界的目的与归宿。研究孙中山的情感世界,对于进一步了解孙中山的人格魅力,了解孙中山为之奋斗四十年的革命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亲情;友情;家国情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与民主革命家,在其积极为中国民主革命鼓与呼的同时,其内心深处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火一样的丰富的情感。这些情感至深、至厚,至宽、至广,是支撑与维系孙中山整个革命生涯的重要基础。研究孙中山的情感世界,不仅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孙中山为之艰苦奋斗四十年的革命事业,而且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走近孙中山,认识孙中山,了解孙中山。

一、孙中山的情感世界

孙中山虽身为男儿身,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叱咤风云、劳顿操持了毕生精力,但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在孙中山的情感世界中,既有父母情、兄弟姊妹情、儿女情,也有夫妻情、友情,更有民族情。其中,亲情是孙中山情感世界的基础,友情是孙中山情感世界的支撑,民族情则是孙中山情感世界的最终目的与归宿。

(一) 父母情

孙中山虽出身贫寒,但与父母之间的情感甚笃。追随孙中山的美国人林百克曾经问孙中山对父母的印象。孙中山说,他非常敬重他的父母。他认为,父亲为人和善可亲,母亲虽然属于缠足女人,但同样值得他敬重。对父母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在孙中山与父亲的关系中,父亲的疼爱是无声的。其中,父亲曾经极力阻止其漂洋过海的愿望,无疑是父爱的深切流露。原因是父亲担心孙中山到外洋有生命危险。在孙中山与母亲的关系中,母亲不仅养育了他,教育了他,而且还成为其人生发展道路的引路人。1879年6月,年仅13岁的孙中山在做通父亲的思想工作后,与母亲一道前往檀香山,看望在那儿发财致富的兄长孙眉。母亲的此一举动,不经意间,彻底改变了孙中山的人生命运。它不仅让年幼的孙中山有机会接受西式教育,从而让孙中山成功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为孙中山往后成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在檀香山,孙中山接受了良好的英语语言训练。他“除了完成学校布置的课业外,还利用课余时间补习中文,浏览中外群书,对于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书籍,以及华盛顿、林肯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特别感兴趣,希望从中能找到他一直追求的真理。他对欧美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们推崇敬仰,并产生了以为师法的念头。孙中山少年时代的一些知识积累,为他以后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往后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与父母虽然离多聚少,但父子情深、母子情厚,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在父亲病重期间,孙中山与兄长孙眉亲临家门,探望父亲。此间,孙中山的第一任妻子卢慕贞女士亦极尽孝心,细心周密地照料孙父。在母亲病重期间,孙中山因革命事务缠身,在忠孝两难全的情形之下,孙中山一方面为病重之中的

母亲筹款治病,一方面写信委托侄儿孙昌前往探望。在1910年4月8日写给孙昌的信中,孙中山指出:“我已开始设法筹款,供你及家属回国之用。不料今日接你父来电谓祖母病笃,需我立即汇款若干,因之,我必须首先听从此急迫的要求,拟于明日汇去港币一千元。故对你之所需不得不稍延,因我不可能同时兼顾。”同年4月25日,因母亲病危,孙中山分别致信孙昌夫妇,促其从速返港探视。1910年7月上旬,孙中山在从日本前往南洋的途中,途经香港。本欲到港探望母亲,但因其特殊身份,不被港府允许。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嘱人迎其母至船,慰问备至,船将动轮乃别。”对此,时人评述说:“先生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独于孝行不忘也。”孙母去世后,丧事由同志罗延年经理。

(二) 兄弟姊妹情

孙中山同胞兄妹4人,他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孙眉和姐姐孙妙茜,下有妹妹孙秋绮。此外,还有一姐姐孙金星及哥哥孙德佑,两者在孙中山出生之前均夭折。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对孙中山的影响极深。孙中山之所以能够留学檀香山,在檀香山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与其兄长孙眉在檀香山创业谋发展有很大关系。后来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从事革命活动,兄长孙眉可谓劳苦功高。作为兄长的孙眉,不仅在经济上作出了巨大捐助,而且在父母与家庭的照料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对此,《孙中山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中有详尽记载。《年谱》称:“戊子年(1888)春达成公(孙中山父亲,笔者注)病故,德彰(孙中山兄长孙眉,笔者注)于数月前闻父病重,已回粤奉侍汤药,至是对于总理(孙中山,笔者注)爱护备至。凡总理所需学资,均允源源供给。故总理在粤港肄业医学多年,用度宽裕,皆德彰所给予者也。”孙中山与姐姐孙妙茜相貌酷似,自幼朝夕相处,共同劳动,备尝艰辛,两人感情至深。对此,《孙中山胞姊孙妙茜琐记》的作者指出:“她(孙妙茜,笔者注)为人忠厚、纯朴而有正义感,对祖国有一棵炽热的爱国心。在她的一生中,对其胞弟孙中山的友爱贯穿始终。”这其中包括:儿时一起上山打柴割草、孙中山劝母不让姊姊缠足、妙茜亲手为孙中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孙中山经济上给予姊姊一定的资助、孙中山去世后妙茜奋力保护孙中山故居等。妹妹孙秋绮在结婚后,夫妇同孙中山之间交往密切。妹夫林喜智与孙中山一直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并曾捐钱支持革命。外甥女林耀梅曾作为孙中山、宋庆龄的贴身侍从,照料他们的起居生活。

(三) 夫妻情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有正式夫妻名份的为二人:一是元配夫人卢慕贞,二是第二个夫人宋庆龄。在孙中山的两任妻子中,情感不一,侧重点也有差别。

1、孙中山与第一任妻子卢慕贞之间的情谊

就孙中山与卢慕贞之间的关系而言,要说两人完全没有情感,肯定说不过去。特别是对于坚守妇道的卢慕贞来讲,他对孙中山始终充满深情厚谊。这不仅体现在卢慕贞对孙中山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上,也体现在卢慕贞对孙中山本人的细心照料与体贴上,更体现在卢慕贞对孙中山第二任妻子宋庆龄的认可上。从卢慕贞与孙中山父母的关系来看,孙中山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与父母聚少离多。同时,孙中山的兄长孙眉亦在外不断打拼。因此,对孙中山父母的照顾,实际上主要依靠的是卢慕贞。特别是在两个老人生病时,更是依赖卢慕贞。卢慕贞对孙中山父母的付出,非常人

可以替代。从卢慕贞与孙中山的关系来看,孙中山平常回家不多,卢慕贞尽管未必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完全理解,但作为女人,我们可以想见,卢慕贞为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奉献。一方面要承担服侍公婆的义务,另一方面还要抚育照料三个未成年的小孩,更主要的是,还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孤寂之苦。同时,孙中山每次回家,卢慕贞总要为他缝制一套新衣服和鞋袜,以表达自己对孙中山的深爱之情。由此可见,卢慕贞将自己对丈夫的爱全部倾注到孙中山的父母、孙中山本人及与孙中山生育的三个小孩的身上了。而对于孙中山而言,虽然因革命活动的需要四处奔波忙碌,但他一旦时间允许即与卢夫人团聚。最为明显的事例有:孙中山母亲去世后,“先生(指孙中山,笔者注)既居寓槟城,卢夫人(指卢慕贞,笔者注)因杨太夫人已逝世,即偕两女由香港前来,与先生住黄金庆之店四间店德昌号,后迁柑子园。”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卢夫人随即携两女经上海于1912年2月20日抵南京,与孙中山团聚,直至3月25日分离。夫妻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前往东南各地考察。1912年5月2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故乡翠亨村,与卢夫人团聚。居留三天后,前往广州。1912年8月,应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前往北京。夫人卢慕贞陪同前往。1913年2月,孙中山前往日本考察铁路建设事项。同年3月,卢夫人亦到达日本,与孙中山相会于日本大阪。从卢慕贞与宋庆龄的关系来看,卢慕贞不仅认可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保持女人所特有的高姿态,与宋庆龄以姐妹相称。同时要求儿子孙科要尊重宋庆龄。卢慕贞对宋庆龄的认可,既支持了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也保持了她与孙中山之间特有的情感与友谊。卢慕贞与孙中山之间的情谊,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进一步得到体认。一方面,卢慕贞与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之间一直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双方有着十分良好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卢慕贞还积极参与到对孙中山故居保护的行列之中。通过这一特殊举动,表达自己对丈夫孙中山的挚爱。

2、孙中山与第二任妻子宋庆龄之间的情谊

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虽然年龄相差27岁,但两人却是因志同道合而走到一起的,属于真正的革命伴侣。两人之间有着共同的情感基础,有共同的理想志愿。早在辛亥革命发生时,当时远在美国留学的宋庆龄就写有歌颂辛亥革命历史作用的文章。孙中山获悉后对宋庆龄的才华很是赏识。在他与宋庆龄之间的婚事遭到宋氏父母反对的情景下,孙中山明确表明了其坚定的立场。他说,只要能够跟宋庆龄结婚,哪怕就是今天结婚,明天死去,都值得。他们俩结婚后,宋庆龄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表示,与孙中山在一起,就好像身居中国革命的中心,令人亢奋。在他们结婚后的十年间,宋庆龄为支持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其中,尤见真情的是,在1922年6月的广州兵变中,宋庆龄能够顾全大局,临危不惧,主动掩护孙中山先行撤离,充分展示了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的深情厚谊。孙中山重病后,在知道自己存世的时间不多的情况下,特意将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招至床沿,将宋庆龄托付给何,要何香凝在其死后“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面对此情此景,夫人宋庆龄早已是悲痛欲绝。这表明,孙中山在临终之前,仍在为自己心爱的夫人宋庆龄着想。其中,至为明显的事例,就是在孙中山临终时的三份遗嘱中,有一份就是专门关于家事的遗嘱,要求在其死后将所有书籍、衣物及住宅等,均归宋庆龄所有。此后,宋庆龄一直牢记着丈夫孙中山的重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继续奋斗着。

(四) 儿女情

孙中山一生忙于革命,为处理革命事务四处奔波,舟车劳顿。尽管如此,他依然十分关心儿女们的成长与发展。其中,儿子孙科从小就被送往檀香山读书,16岁时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支持孙

中山的民主革命活动,参与革命党的办报工作。1912年21岁的孙科又被送往美国留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孙科养成了喜好读书的习惯。在国民党中央,孙科以能“看看书”而闻名。孙科后来官至广州市市长、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行政院长、副主席等职,这与孙中山对其深刻的培育与影响不无密切关系。在关心长子健康成长的同时,孙中山对另外两个女儿的正常成长同样颇付心血与关爱。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孙中山在南洋开展革命活动时,曾特意聘请当时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颇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四川人雷铁崖作为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两个女儿随母一起前往南京与父亲团聚。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后,访鄂、沪、闽、粤等地,二女同行,不离左右。1912年6月底,两个女儿同时被派往美国求学。后来,长女孙姪因病中断学业到澳门疗养。孙姪在病重期间,孙中山专程从上海前往澳门探视。

(五) 朋友情

孙中山革命一生,朋友至广。在其开展民主革命活动的过程中,结交了大量好友。朋友的影响与支持,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力量源泉。在此,仅略举四例加以分析。

1、孙中山与邹容

孙中山比邹容年长近二十岁,同时两人也未曾谋面,但两人在民主革命中的相互影响却不容否认,可谓真正的文字之交。正如尚明轩所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使邹、孙二人自然地彼此关注,相互影响而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同志和战友。”邹容在参加民主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其代表性著作《革命军》就是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而完成的。与此同时,孙中山将《革命军》作为其宣传革命的重要宣传品,组织重印《革命军》上万册寄往美洲各地,向广大华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他赞誉《革命军》说:“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邹容被孙中山追赠为陆军大将军,对其革命事迹予以充分肯定。直到1919年,孙中山在著书立说中还念念不忘邹容,极力称赞《革命军》在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认为《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在肯定《革命军》传播革命理论所具有的重大功效的同时,孙中山本人亦深受《革命军》的重要影响。譬如:将革命党改称为革命军;在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中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图景用条文形式固定下来;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

2、孙中山与章太炎

孙中山与章太炎同为辛亥时期知名革命家。他们两人因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一起,因工作上的分歧与误会而各执一端,但最终还是以大义为重,共同为民主革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他们之间的情谊堪称革命情谊的典范。两人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景之下,有过分歧,有过矛盾,但最终能走到一起,说明革命大义远远超越了个人之间的恩怨。章太炎最早知道孙中山的信息是从1897年春路透社电讯报道孙中山在伦敦获释的消息中获悉的。此后,孙中山与章太炎于1899年6月相识于日本。1902年2月章太炎第二次流亡于日本时,两人始建立良好的友谊。对此,章太炎在《口授少年事迹》中有所追述:“余辈常自东京至横滨,中山亦常由横滨至东京,互相往来。”1906年7月,章太炎第三次流亡日本时,孙中山与章太炎的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此间,章太炎不仅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而且还亲自主编《民报》,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1907年春,因同盟会经费的问题、起义枪械运输的问题等原因,孙中山与章太炎之间产生诸多误会,导致两人的关系跌入低谷。辛亥革命爆发后,两人关系重又恢复。但此后因陶成章被杀一事,两人矛盾又生。直至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爆发,两人

重拾革命情谊,共同对付独裁的袁世凯政府。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章太炎还亲自为孙中山作墓志铭《祭孙公文》。

3、孙中山与黄兴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黄兴是其非常重要的同道人。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到广州起义的爆发,从武昌起义的爆发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从临时政府北迁到任南京留守,从中国同盟会改组到反袁的“二次革命”。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到黄兴与孙中山密切配合时忙碌的身影。在孙中山的朋友中,黄兴堪称孙中山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密友。在民主革命活动中,黄兴处处以大义为重,从大局出发,尊重孙中山,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表现出一个革命家所应有的高贵品质和美好的人格。在中华革命党成立的问题上,黄兴虽然不认可孙中山的一些做法,但他并没有走上反孙中山的道路。明确表示:“我从事革命,时时本着至诚服从孙中山。”袁世凯复辟失败后,黄兴毅然从海外归国,与孙中山一起共商国是。

4、孙中山与宋嘉树

宋嘉树是宋庆龄的父亲、孙中山的岳父。当年宋嘉树起初虽然对女儿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事持不赞同的态度,但事后还是予以默认并一如既往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于宋嘉树而言,终其一生,他与孙中山之间的革命情谊,至深至厚。宋嘉树不仅在思想上、行动上极力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而且在经济上给予孙中山以大力的支持与付出。对此,孙中山在《致李晓生函》中作了简要的介绍与评述:“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知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此表明,宋嘉树始终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简而列之,有以下四端:事例一:1894年12月4日,宋嘉树的长子出生时,他把孙文看作“正义之火的象征”,是中国的华盛顿、林肯,希望自己的长子能象孙文一样救国救民,将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富强之学,传遍古老的中华大地,振兴中华,于是给长子取名为“宋子文——即宋家之子‘文’”。事例二: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经费作为主要问题被列为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作为孙中山的好友、“主要财务管理人”之一的宋嘉树也应邀出席了本次盛会。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宋嘉树勇敢地承担了为同盟会筹集经费的重任。为此,宋嘉树专程前往美国开展经费募集活动,并募集到相当的经费,为解决同盟会经费上的困难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事例三:在宋嘉树的教育与影响下,其子女宋霭龄、宋庆龄和宋子文均受到民主革命的洗礼与锻炼,并且都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其中,宋庆龄还与孙中山结为伉俪,更是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佳话。事例四:细心呵护孙中山的生命安全。作为孙中山的密友,宋嘉树不仅在思想上、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而且在孙中山的人身安全问题上也给以无微不至的呵护。1911年冬天,孙中山归国时,宋嘉树携女儿宋霭龄亲自到上海码头迎接。在上海,为确保孙中山的人身安全,宋嘉树从商团书业公会分团中,亲自挑选了一批有文化的排字工人充任孙中山的贴身卫队。同时,为孙中山在上海的住处张罗,与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交涉派员保护孙中山在沪活动的安全问题。1912年1月1日,在孙中山由上海前往南京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的路途中,宋嘉树直接承担孙中山的警卫任务,为孙中山的人身安全尽心尽力,付出了大量心血,从而确保就职仪式得以顺利举行。

(六)民族情

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其情感世界中,民族情是其最高的一种情感。而这一情感是其整个民主革命活动的核心支

柱。正是有了这一重要支柱,才有其为民族解放与国家振兴事业而殚精竭虑的不竭动力。在孙中山的整个人生中,从上书李鸿章到成立兴中会,从成立中国同盟会到武昌起义的爆发,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到“二次革命”的爆发,从反袁斗争到护法运动、护国战争的爆发,从改组国民党到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动力源泉皆归因于其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怀与革命大义。在孙中山的整个人生中,无论革命也好,建设也罢;规划也好,行动也罢,孙中山心中似乎总有一团熊熊的大火在燃烧着,在喷发着。而这团大火就是他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厚情怀。对此,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给予高度概括与肯定。胡锦涛同志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二、孙中山情感世界的特点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在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同时,同样是一个情感世界极其丰富的人。在其情感世界发展的历程中,孙中山虽然曾经系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与影响,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他内心深处,同样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情感世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影响,造就了孙中山极其丰富的情感世界。与此同时,从总体而言,孙中山的情感世界还体现出独到的、极其鲜明的特点。主要有如下诸端:

(一)文化继承性

孙中山的情感世界中,继承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譬如:孝道文化、中庸文化、仁爱文化等。这与孙中山自幼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他自称:“仆……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二汉之文。”据《年谱长编》记载:孙中山自幼“所习功课有《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孙中山的情感世界中,强调对父母应孝敬,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应和睦相处,对社会应讲求仁爱与付出。这样,家庭才会幸福,社会才能和谐。

(二)宽广包容性

宽广包容性是孙中山情感世界的重要特性。由于孙中山先后接受中西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其情感世界颇具宽广包容性的特性。正如于建福在分析孙中山的思想文化特性时所言:“孙中山在为造福国家振兴中华而进行的求索奋斗中,将其演说根植于儒家文化的深厚沃土之中,理性地善待固有文化,既不像西化派那样仰慕西学而贬抑儒学,也不像国粹派那样奉儒学为圭臬而拒斥西学,表现出‘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而孙中山自己也曾对日本友人说:“耶稣说,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何况同情我们的人?我们革命主义者的军事组织之中,必须具有宗教上宽容的德。”在这一思想文化特性的主导下,孙中山结交的朋友,有国内朋友,也有国外朋友;有会党朋友,也有知识精英界朋友;有革命党内朋友,也有革命党外朋友;有城镇市民朋友,也有乡村农民朋友,甚至还有宗教界朋友。其朋友范围之广,可谓遍及海内外。其中,特别是在海外华人世界中,为着革命的实际需要,孙中山有着相当多的华人华侨朋友。

(三)叛逆创新性

孙中山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在其情感世界中,一旦认定为合理的事情,即勇往直前,敢于担当,体现出叛逆创新特性。譬如:在皈依基督教的问题上,不顾兄长的反对,一意要求皈依基督教,并吸收其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要旨奋力发动反清革命;在与维新派的论战问题上,坚决反对其保皇、改良的思想主张,倡导革命共和的思想主张;在革命反清的问题上,认为要改变

中国落后、贫穷、黑暗的现状，舍革命反清而外别无他途；在与宋庆龄的婚姻问题上，为了双方共同的理想与信念，不顾家庭、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反对，跨越年龄时空的界限，扬起爱情的风帆，坚毅果敢地走到一起；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建的问题上，做到唯才是举，打破论资排辈的陋习；在反袁独裁的问题上，力排众议，反对协商、法律手段解决，力促通过革命手段解决袁世凯独裁的问题；在组建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强调依靠个人人格的魅力来推动革命发展；在护法运动与护国战争的问题上，主张同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破坏中华民国国体的行为作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在如何解决农民利益的问题上，倡导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倡导弘扬宗教的爱国性，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在如何开展与共产党联合的问题上，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加强双方的联合，建立统一战线，应对共同的敌人。凡此种种，在诸如此类的大是大非面前，孙中山始终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不流俗套，体现出其情感世界中鲜明的叛逆创新性。这种叛逆创新性，构成孙中山情感世界中最为可宝贵的优秀品质。

（四）爱国性

爱国性，是孙中山情感世界中十分重要的特点。对孙中山的爱国精神，党的历代领导人均给予了充分肯定。其中，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强调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其中自然包括要用近代中国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他说：鸦片战争以来，“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1996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强调：“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2011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指出：“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透过孙中山的人生奋斗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作为一代杰出的革命党人，在其情感世界中，决不是那种整天沉溺于儿女私情中的人，而是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人。真正做到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其情感世界的爱国性特点十分突出。譬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在部分人的怂恿下，谋求当广东都督。对此，孙中山从大局出发，坚决反对兄长担任广东都督，表现出一个革命党人应有的高风亮节。再如：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孙中山考虑的并不是个人官位的得失问题，他考虑最多的是中华民国的建设问题，人民大众的福祉的问题。其中，在铁路建设的问题上，他认为，铁路建设是二十世纪初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因此提出在中国建造10万公里的铁路计划；在民生建设的问题上，他认为，民生问题是国民党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于全国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在处理当官与做事关系的问题上，他强调，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这些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综上所述，在孙中山的情感世界中，父母情、夫妻情、兄弟姊妹情、子女情是其情感世界的基础与前提，朋友情是其情感世界的支撑，民族情、国家情则是其情感世界的目的与归宿。作为一代历史伟人，孙中山始终胸怀祖国，挚爱人民，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与心血。而今斯人虽逝，但复兴的中国梦仍将继续！

参考文献

- [1] 尚明轩主编：《一代天骄孙中山的历程》（增订本），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 [2]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4页。
- [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08页。
- [4]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7页。
- [5] 李伯新：《孙中山胞姊孙妙茜琐记》，《世纪》2000年第5期，第42页。
-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9页。
- [7] 尚明轩：《邹容与孙中山》，《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83页。
- [8]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8页。
- [9]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 [10]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76页。
- [11] 转引自吴志明：《黄兴与孙中山的真诚友谊》，《钟山风雨》2003年第6期，第43页。
- [12]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2页。
- [13]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10月9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 [14]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48页。
- [1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页。
- [16] 于建福：《因袭国学·规抚欧学·独见创获——孙中山的文化自觉及其中庸教育哲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6页。
- [17]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05页。
- [18]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 [1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
- [20] 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206页。
- [21] 江泽民：《纪念孙中山》，《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3页。
- [22]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10月9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 [23]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6-127页。

作者简介

周术槐，男，汉族，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贵阳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